

世界经济低迷 中国稳中求进

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增速预期下调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徐明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海冰**

徐明棋：2016 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仍然动力不足，处于相对低迷的阶段，不同国家的增长不平衡和分化进一步显现。

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向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2.9%，大大好于此前预期的 2.6% 和第二季度的 1.4%。欧洲经济也在复苏进程中，欧盟整体经济第三季度同比增长 1.8%，欧元区增长 1.6%，是欧洲自欧债危机以来增长形势最好的一年。但是，欧洲目前面临成员国经济增长失衡问题，加上希腊债务遗留、意大利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等问题，欧洲经济增长前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受英国脱欧、欧盟内部困难民

危机和恐怖袭击引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和思潮影响，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国都存在着政局不稳的问题，将对欧盟的一体化和经济带来非常不利的冲击。

日本经济虽然也在复苏，但是今年经济增长大约只有 0.9%。安倍经济学的大规模量化宽松的刺激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是从长期看，日本经济的问题和隐患仍然很大。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已经达到 GDP 的 250% 以上，将不得不采取措施缓解。日本从 2011 年开始连续 5 年出现国际贸易逆差，2016 年在日元贬值的背景下开始好转，但是随着日元升值，下半年又出现逆差，对日本经济将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

在全球经济复苏相对疲软、国际贸易增长率不断下滑的背景下，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很多国家对外依存度很高，出口贸易下降直接导致它们

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巴西、南非、阿根廷都处在衰退或非常低迷的增长泥潭中。印度增长率原来不错，但是废除大面额纸币流通事件导致印度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7.6% 下降至 7.1%

张海冰：2016 年世界经济具有明显的低增长和高风险特征。尽管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都采取了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但是世界经济增长并没有实质性起色，却累积了大量的债务和资产泡沫。与此同时，以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事件频发，对世界经济的平稳复苏构成了新的挑战。

对于低迷复杂的世界经济局势，20 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公报做出了精准描述：“经济增长仍弱于预期。金融市场动荡、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贸易和投资低迷、一些国

家生产力及就业增长缓慢下行风险犹存。地缘政治走向、难民增加以及恐怖主义冲突等挑战导致全球化前景复杂化。”

从经济数据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今年和明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 2016 年和 2017 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 3.1% 和 3.4%。发达经济体今年仅将增长 1.6%，低于去年的 2.1%，和 7 月 1.8% 的预测。

美国经济增长预测从 7 月的 2.2% 下调到 1.6%。英国经济受脱欧影响，增长预计从去年的 2.2% 放缓到今年的 1.8% 和明年的 1.1%。欧元区经济今年将增长 1.7%，明年为 1.5%，而 2015 年为 2.0%。日本增长为 0.5%，明年为 0.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 6 年来第一次加快，升至 4.2%。新兴经济体 2017 年预计增长 4.6%。中国增长预计从去年的 6.9% 降到今年的 6.6% 和明年的 6.2%。相比之下，印度今年和明年预计增长 7.6%，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

汇率：美元进入强势 汇市面临考验

张海冰：年底美联储决定加息 25 个基点，同时上调了 GDP 与通胀预期，并表示 2017 年预计将可能加息 3 次，表明美元已经开始进入强势通道。

美联储决定加息主要基于美国经济复苏的积极展望，此前国际市场对加息预期已经有了充分预估，因此加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有限。从长期看，应该高度关注美联储加息带来的两方面直接影响。第一是强势美元的影响。美元走强对美国经济来说很难说完全利好，对美国出口和就业创造则具有负面影响。相对于强势美元，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面临贬值压力，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第二是对全球资金流向的影响。美联储加息有可能加速资金回流美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其余保持低利率的发达经济体，比如日本和欧元区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全球金融市场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而言，可能面临两方面难题。第一是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外汇储备不至于过快流失，第二是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份额，特别是在鉴于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考虑，短期内资本账户不太可能开放的情况下。

总之，进入 2017 年以后，美联储加息的步伐和力度需要密切关注，特别是特朗普经济政策走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有可能遭遇新的意外波动。



■ 纽约三大股指 14 日因受美联储加息影响而大跌

图 GJ

徐明棋：特朗普国内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用减税来刺激投资，美国如果真的像宣称的那样将企业所得税降至 15%，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导致美国金融市场上扬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美国经济存在有利的一面。但是如果大幅度减税而不能减少财政开支，美国财政赤字将会大幅度上升，必然导致债务增加，并对通货膨胀产生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提高利率的步伐将会比 2016 年快很多，今年年底的加

息可能开启 2017 年多次加息的大门。

美联储加息对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影响是会刺激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资产价格上升。而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出，则会加剧一些已经陷入低迷增长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震荡，甚至会发生局部的金融危机。不过，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比较好，即使美联储 2017 年连续提高 3 次利率，也不会使新兴市场国家发生连锁性的金融危机。

TPP：“老大”美国退出 并不等于死亡

徐明棋：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重视外部市场和国际贸易，相反，特朗普会更加重视外部市场，只是不会再为了他认为的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利益而牺牲美国企业，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传统行业的利益。他要重新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传统能源、军工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必须靠贸易保护才能获得发展空间。

美国不再支持自由贸易是否意味着 TPP 死亡？我认为说死亡为时过早，但是一定会使得 TPP 休克，是否死亡还要取决于美国未来发展和调整。至少在特朗普任期内，TPP 不会复活。

很多人认为，这会给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带来机遇。但是由东盟+中、日、韩、澳、新、印加入的这一区域自由贸易体制，虽然已经取得不

少进展，在许多核心领域仍然有待协商和谈判。而且 RCEP 涵盖的谈判内容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自由化不是主要内容，与 TPP 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当然，在 TPP 休克的情况下，RCEP 如果能够取得突破，对维护亚洲自由贸易环境的确是非常积极的，应该以此为契机努力推动 RCEP 签署。

与 RCEP 并行的另一个区域贸易安排是在 2014 年中国 APEC 峰会上由中国重新推进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TPP 的搁置如果能够使得 FTAAP 获得新的动力，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基本格局就不会因特朗普开倒车而出现根本性变化。

张海冰：退出 TPP 是特朗普竞选总统过程中的策略性选择，为了保护美国贸易利益，迎合国内保护主义和增加就业的呼声。美国最终是否会退出 TPP 还存在变数，竞选口号和政策形成不一定完全一致。

即便美国退出 TPP，也不能代表 TPP 宣告死亡，TPP 代表的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标准仍然会对全球和地区层面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产生持久性影响。况且日本在推进 TPP 进程中开始呈现更为积极主动的领导者角色，即使美国缺席，TPP 还是会继续。

RCEP 与 TPP 一直是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两股重要推动力量，两者并不矛盾也不冲突。美国退出 TPP 反映了现任奥巴马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国内各利益集团的诉求。相比之下，RCEP 的模式更加注重灵活性和适应性，兼顾参与成员的各自国情，比较务实。

总之，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从长远来看不可能缺席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不管 TPP 和 RCEP 进展如何，在 APEC 框架下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是最终目标。

明年不确定性增加三大难题困扰

徐明棋：2017 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政策走向，但其基本经济方向大致还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更多地动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压贸易伙伴为美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美国将不再坚持传统的自由贸易，而是会坚持所谓互利和对等原则。如果特朗普对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实施严厉的保护主义政策，那么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都会带来很负面的影响。

2017 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对中国经济而言是机会与挑战并存。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保持稳定，对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求进是有利的。但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政策的可能性，对贯彻中央 2017 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任务会产生一定冲击。

因此，加强金融风险的管控，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以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探索为引领进一步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我们就能够在 2017 年多变而不确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张海冰：明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

第一，低速增长。全球贸易增速连续多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同时全球投资占全球 GDP 比重也持续下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失速。究其原因，有效需求不足是主因。G20 杭州峰会虽然给出了综合运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药方，但是药效如何需要时间。

第二，贫富差距加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和经济意外事件，几乎都与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加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有关。对现实的不满演变成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经济保护主义抬头。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跟不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治理碎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矛盾现实长期并存。总的来看，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削弱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民意基础，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投资的各项措施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全球治理不仅存在能力问题，治理的共同意愿也在下降。